

互惠共同体的形塑：《铁路边的孩子们》中的空间伦理

郭星, 刘庆来

(西安工业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伊迪斯·内斯比特的儿童小说《铁路边的孩子们》具有多层次的空间伦理内涵,小说借助多重地理空间的叙事呈现,描绘了互惠共同体的空间建构过程,以此呼应二十世纪初叶英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期的伦理构想与道德实践。小说具体涵盖三重空间伦理结构,即塑造家庭互惠共同体的家庭伦理空间,构建社群互惠共同体的公共道德空间,以及旨在建构跨阶级/地域互惠共同体的铁路空间,突显了内斯比特寄寓于儿童主体性的道德建构理想。

关键词:内斯比特;《铁路边的孩子们》;空间伦理;互惠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24)03-0085-09

英国作家伊迪斯·内斯比特(Edith Nesbit, 1858—1924)的儿童文学作品享誉英国乃至世界儿童文学发展史,其开创的英国儿童文学创作范式被称为“内斯比特传统”(Nesbit Tradition),并为后世很多儿童小说借鉴模仿,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英国儿童文学创作。正如评论家马库斯·克劳奇(Marcus Crouch)指出的,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家无一例外地受益于内斯比特的创作。^[1]¹⁶内斯比特个人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其作品惯于展现儿童主人公经受生活的考验与历练,依靠与同伴的合力协作,攻克难关,通过正确的伦理选择化解伦理困境,最终获得道德情感的升华。其代表作《铁路边的孩子们》(*The Railway Children*, 1906,以下简称《孩子们》)即是上述创作范式的代表。

在《孩子们》中,作家借助精巧的构思与真挚的笔触,描绘了二十世纪初叶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景观、儿童精神风貌与工业社会图景。该小说自发表以来,持续引发了文学批评界的评析与阐释,其中的重要聚焦点之一就是探析此小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相关问题如父权制、现代性的展现与改良构想,例如诺伊曼(Chamutal Noimann)参照内斯比特的费边主义改良思想,探讨其小说文本呈现的父职缺位这一普遍社会现象,强调作家将此视作冲击父权制传统的重要契机,进而建立公正正义的社会主义主体体系。^[2]安德森(Susan Anderson)则着重剖析小说文本中的铁路这一核心意象,及其涵盖的象征结构,由此解读文本涉及的时间与现代性等问题。^[3]帕克斯(Christopher Parkes)指出,小说中富于想象力的儿童形象,昭示着中产阶级的创造力与独创性,而儿童游戏则作为中产阶级谋生于缺乏稳定性与公平正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必要手段,进而获得谋取福祉的能力与权利。^[4]围绕这一论题,现有研究忽视了空间的变化对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影响与构造,而《孩子们》中存在大量关涉空间的文本内容是与现代英国社会共同体形塑密切联系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此方面内容的读解与分析,补充推进学界相关论题的讨论广度与深度。

毋庸置疑,《孩子们》中对家庭、社群、现代社会空间的文学呈现包含了重要的伦理内涵,空间书写与伦理选择、道德秩序建构之间相互作用与促进,从而提供了独特的共同体伦理。具体而言,内斯比特的这部小说作品依托家庭空间、公共空间与铁路空间等多重空间展开其故事,结合叙事进程的推进形塑出家

收稿日期: 2023-11-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8XJC752001)

作者简介: 郭星(1981—),女,山西太原人,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庭互惠共同体、社群互惠共同体、以及跨阶级/地域互惠共同体等空间伦理秩序。本文基于上述三重维度的空间伦理表征,借助家庭动力系统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以及移动性理论,探析内斯比特小说中儿童主人公道德理想建构与新型伦理关系形成的路径,进而透视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伦理秩序与共同体的建构。

一、家庭空间与家庭互惠共同体

家庭空间(以家宅为核心载体)往往是人获取物质与心理支撑的重要空间场所,“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5]此外,家庭空间与其中包含的精神情感生活对个体的伦理道德意识塑造、伦理身份认同与伦理理想实现起到关键性作用。它往往“有一种伦理功能,把我们从日常的平凡中召唤出来,使我们回想起那种支配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的价值观;它召唤我们向往一个更好的、有点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使我们充满另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梦想。”^[6]²⁸⁴ 小说《孩子们》中的家庭空间突出呈现为孩子们与其母亲在家庭变故发生之后所搬往的位于乡间铁路边的新家——“三烟囱”(小说中母亲与孩子们的住所的名称)。这里既是一家人赖以生存发展、深化情感联结、完善伦理关系的居住空间,又承载了家庭教育与道德教化的功能,映射出家庭系统内部的行为实践、心理过程与关系模式等。在这个居住空间中,借由对家宅的功能分区进一步形成诸多小的空间,在其中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相互支撑,共享情感价值,伦理关系在不同空间的分配与重组基础上建构了家庭互惠共同体。

巴恩希尔(Barnhill)总结概括得到稳健有序的家庭运作系统的特征加以,包括个性化、交互性、灵活性、稳固性、认知清晰、沟通畅通、角色互补以及代际界限明晰等要素。^[7]显而易见,小说中的家庭系统,契合了巴恩希尔对于正常有序、积极稳健的家庭运作机能的界定,表现为支撑母亲与孩子们生存发展、情感交互与伦理价值共享的动力系统。母亲与孩子们始终维系着蓬勃强劲的家庭动力,彼此提供或者共享情感价值支撑与内在心理互动,这一切都是依托于家庭空间“三烟囱”而实现的。这一承载家庭伦理的家宅空间囊括了多重伦理功能的空间分区,例如,饭厅、厨房作为母亲与孩子们日常生活活动的空间,承载了情感交流的伦理功能;母亲的工作室在构建家庭经济伦理、凸显新的工作伦理价值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花园则承担着进行审美教化、陶冶美好心性的伦理功用等。

(一)生活空间的重塑与互助性伦理关系建构

饭厅、厨房等日常家庭生活空间是母亲与孩子们朝夕相伴、深化情感联结的重要场所,发挥着重要的家庭伦理塑造作用。小说的开端,遭遇陷害的父亲身陷囹圄,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使得先前美满温馨的家庭生活戛然而止,母亲与孩子们被迫搬离既往的住所,前往乡间铁路边的住宅定居。家宅空间的迁移与变动是同完整家庭结构的缺失,中产阶级理想家庭生活模式的终止相关联的。然而承载道德伦理实践的家庭动力系统并没有因为空间的变动而发生伦理结构的失衡,小说中母亲与孩子们组成的家庭仍旧维持着正常的运作机能,并且在新的家宅空间的经营过程中发展出崭新的家庭伦理关系,而这一关系是建立在孩子在家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伦理功能突显基础上的。与传统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伦理结构中突出父亲的主体地位与中心伦理功能不同,小说中的新家庭逐渐形成了主体间的互助伦理关系,其中包含了两重关键要素,其一,权威性相对弱化的母性核心对家庭其他成员参与家庭伦理秩序建构的引导作用,其二,孩子在家庭生活劳动实践中确立起的主体性意识及其在家庭伦理关系动态形成中的参与作用。

爱德华时期的英国社会,家庭伦理特别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无比疼惜与关爱备至。这一理想的家庭伦理模式要求母亲在家庭中倾注全副心血与精力,以实现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料与呵护。在社会普遍观念的影响下,父母对儿童生理、心理特质的概念性认知愈发深化,对待儿童的态度、方式较之以往也愈发合理化。^[8]在此家庭关系模式中,称职合格的母亲作为“现代化的发明”^[9]相应地居于整个家庭伦理观念的核心位置。因此,自19世纪以降,关于母亲这一身份的定义愈发强调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慈爱与抚

育职能。^[10]与此相对应的是,父亲居于整个家庭的权威中心,家庭中的孩子处于被动接受呵护、疼爱与教导的位置。

小说中体现的母亲的形象正是经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塑造而成为爱德华时代典型的英国家庭母职范式,其核心功能是养育、慈爱与教化。然而,由于父亲因变故而在家庭中缺席,孩子与母亲的家庭功能发生了微妙的改变。面对困难艰辛,儿童此时不再是家庭的被动者,反而积极加入了家庭的重要决策中,为家庭遭遇的难题集思广益,与母亲共克时艰。琐碎的生活事务与家庭劳动不仅密切了孩子们与母亲相互配合,也重塑了家庭的伦理关系。例如,母亲卧病在床之际,孩子们通力协作,忙前忙后地照料母亲直至其痊愈康复。此时的亲子伦理中,原本母亲照料孩子的关系发生反转,孩子承担了“照料”的母职功能。

在这样的亲子伦理关系模式下,母亲与孩子在家庭中的伦理位置不再是固定不变的,灵活变通、随时调节的家庭关系在家庭的重大变故面前显现出强大的共同体凝聚力。面对艰难坎坷,一家人全无低落悲伤,反而始终抱持昂扬的信念与热情,乐观地寻求解决方法。小说中,当母亲与孩子们需要搬离城市的住宅去乡下生活时,面对艰巨繁杂的搬迁事务,孩子们不再被视为能力欠缺的儿童,在成人的事务中置身事外,而是积极主动地协助母亲收拾行囊,尽管依然手忙脚乱,却自得其乐,并且这些努力也得到了成年人的认可。

同时,上述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化是与小说中居住空间的变迁密切相关的。与典型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伦理秩序相关联的是舒适的城市家宅空间,而这一空间在小说的开始就成为被放弃的空间,母亲和孩子所构成的新家庭需要迁往远离城市新家。家宅空间处所的变更与迁移,因此具备了重要的空间伦理意义。搬家这一事件本身即促使孩子们参与到原本只属于母亲的繁杂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这一参与的过程正是孩子们道德实践与伦理秩序的建构过程,即脱离既往被动化的伦理处境,与母亲积极配合协作,合力整顿新居,并协助母亲展开种种琐碎的安顿事务。通过对于家宅空间的安置与整顿,与此密切关联的家庭伦理关系得以建构、强化。在搬迁新居后,孩子们对新的住宅空间兴致勃勃的探索过程意味着新的家宅空间是孩子们参与建构的,处处体现出儿童主体性的空间,而不再是由成人所建构,儿童仅仅被动身处其间的空间。在母亲的引导下,孩子们形成了积极豁达的品格与互助共济的伦理关系。

(二)“妈妈的工作室”与伦理秩序的内外联动

如果说在《孩子们》这部小说中,当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失衡之后,因孩子们主观能动性的激发重新构建了新的母子间互助式伦理关系,那么伴随着照顾与被照顾式母子伦理关系的消解,母亲新的伦理身份的获得表征为一个全新的空间,即被孩子们称为“妈妈的工作室”的房间。这是一个独立于家庭生活的封闭空间,母亲需要在这里撰稿写作以获得收入,因此它很明显是一个工作空间,也是传统母职属性所不曾拥有的空间。这一空间的获得是在一个父亲缺席的非理想家庭中实现的,母亲临时性地被迫承担起父亲的社会经济功能,因此母亲的工作空间不仅仅是一家人居住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具有对于家庭伦理关系重组的重要象征意义。

由于理想家庭的母职功能包含了对孩子的生活照料与道德教诲,父亲则是社会经济伦理关系在家庭中的延伸。因此,“妈妈的工作室”作为父职与母职的双重空间象征,既是家庭进入社会经济关系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工作场所,也是私人化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产生联结的功能空间。一方面,爱德华时代的社会伦理价值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就形成的一系列被称为“维多利亚主义”(Victorianism)的核心理念,即“工作的福音、认真的品格、体面、自助”^{[11]450},它经由此空间得以影响并形塑核心家庭的伦理关系与道德功能秩序;另一方面核心家庭伦理亦借助母亲与孩子的亲密联系,经过情感层面的影响与传导,反向回应并影响了社会伦理秩序的塑造,借以形成伦理秩序的内外联动与互惠。

《孩子们》通过赋予母亲工作空间从而重构了家庭伦理秩序:一方面,母亲通过传统上归属其间的生活空间继续承担其母职属性所包含的道德训诫与伦理教化,依托言语教诲、训导的路径机制,以及身体力行的潜在影响,深切地施加着形塑作用,推进核心家庭动力系统的运作与维系;另一方面,母职属性由于

受到父职伦理功能的分割变得不完整,从而为儿童在家庭中补足母职功能从而获得自身伦理关系的重构提供了机会。

在小说中,中产阶级现代家庭生活的戛然而止意味着典型中产阶级家庭伦理秩序受到了挑战,突遭变故的母亲与孩子们不得不自力更生,母亲不能在生活空间中行使充分的陪伴照料职责,反而长时间隔离在“妈妈的工作室”中,通过工作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行。由此,“妈妈的工作室”这一空间始终暗含着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伦理价值内涵,发挥润物无声的伦理示范效用,呼应着爱德华时期自立自足的社会伦理美德规范。小说在写到“妈妈的工作室”这一空间时始终凸显出其封闭性、隔绝性的特征。这一空间是与生活空间相隔绝的,它隔绝了社会空间与孩子们的家庭空间,从而让儿童能够不受到社会空间中伦理秩序的入侵,以尽可能维持家庭伦理秩序的平衡与稳固。与此同时,这一空间又是这个家庭秩序得以维持所必须获得的社会经济支持的唯一来源,也是社会伦理价值的集中表征空间。因此,围绕“妈妈的工作室”这一空间,社会伦理与家庭伦理形成内外联动,维系核心家庭自立自足的同时,承担着社会伦理的教化功能。

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即母亲因生病而无法工作和照顾孩子们,这意味着母亲的养家糊口的父职与照顾儿童的母职双重伦理功能的丧失,面对这一状况,孩子们承担起了照料的母职伦理功能,却无力填补父职功能的缺失。束手无策的孩子们迫不得已地向外界寻求援助,希望借助工作之外的途径获得经济支持,不料这一行为却招致母亲的严厉批评。母亲坚持了自力更生的道德态度与价值准则,严厉贯彻着“维多利亚主义”的社会伦理观念,自觉维护着其背后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结构。由于母亲在家庭中对于孩子们道德人格的培育起着关键性作用,从而得以将中产阶级的社会伦理延伸进家庭伦理教化之中。可以说,小说中中产阶级家庭系统的稳定性依然是建立在其伦理关系的延续性与完整性基础之上的,并成为孩子们乐善好施、积极参与社会伦理实践的必要前提。只不过,这种完整性是通过家庭成员的代偿性伦理关系重构来实现的,母亲承担了父职的伦理功能同时兼顾其母职功能,在母亲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孩子们补充了母亲伦理职能的空缺。这一切又是通过家宅空间的功能性区分来表征的:即母亲拥有了独立的工作空间,孩子们在生活空间的主宰方面获得了明显的主动性。与此同时,母亲的工作空间作为家庭与社会伦理关系的连接象征,为家庭伦理关系的维系提供了内外联动的可能性。由此,自立自助、自尊自强的社会经济伦理作为建构公民社会互惠共同体的重要前提,在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所形成的坚实牢固的联动机制中促进了互惠共同体的发展。

二、公共空间与社群互惠共同体

共同体叙事或共同体的文学表征,作为深植于民族无意识的英国文学传统,“是英国文学史上繁衍最久的题材之一,也是历代作家自觉的美学选择”“英国作家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命运共同体的书写真实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社群的结合方式、精神诉求及其境遇和命运”^[12]。除却前述的家庭互惠共同体,内斯比特在《孩子们》的文本叙事中,亦力图使发源于家庭空间的互惠关系,扩展至社群与社会层面,即依托公共空间构筑社群互惠共同体。《孩子们》围绕火车站站厅、站台延展出其他居民空间,这些空间共同组成了小说主人公核心家庭所处的公共空间。人们在其间的伦理交往与互动,使这一空间具有了探讨与构建公众伦理价值基础的功能。小说通过设置不同的叙事情境,提出了公共伦理形塑过程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并通过人物的伦理选择达成了伦理共识,强化了公共伦理价值,形塑了公共伦理情感,进而建构了社会道德支持网络,形成基于互惠互助伦理的价值共同体。

(一)邻里空间中互惠共同体伦理情感的共享

小说《孩子们》中,在主人公家庭空间之外又与家庭空间紧密相关的空间是社区邻里空间。小说通过对邻里生活空间的呈现,并通过主人公与在此空间中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伦理互动,乃至某些重要的仪式化交往,实现了社群共同体内部伦理情感交流与共享,从而推动了互惠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例如,孩子们

为搬运工人珀克斯筹备生日惊喜,并代表社区邻里向他赠送生日礼物的仪式化过程。孩子们借珀克斯的生日将邻里间的感情联接起来,依托礼物的收集、赠与等仪式,推进了集体性、公共性的情感联结,使社群共同体成员间的伦理情感得以交流与共享。这一过程发生于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间,彰显了公共伦理形塑与道德秩序建构的功能意义。

孩子们筹备、赠与礼物的行为,“被计划、预测与精心构思……它们把一群人聚集成一个共同体”“体验仪式情感本身的高潮。”^{[13]94} 孩子们辗转于糖果店、杂货店、布店、诊所、肉店、旧农舍等场所,借由仪式化的互动过程,筹集到了烟斗、半磅茶叶、羊毛围巾、松鼠标本、一块肉、半打鲜蛋等礼物,每件礼物都附有表达谢意、敬意与祝福的字条,最终使得承载互惠伦理的诸种礼物汇聚于珀克斯的住所。

小说通过详细叙述珀克斯对待礼物前后不同的态度变化,强调了作为礼物的各种物品在伦理属性上的特殊意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伦理系统中,物品的属性天然与价值、货币相关联,附着其上的是经济伦理关系。因此,当珀克斯收到礼物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物品的赠予是与他的经济身份相关连的,它们暗示了他的贫穷,从而对他造成了人格侮辱,他激烈地拒绝接受这些物品。但当孩子们以仪式化的方式为珀克斯一一念出物品的赠予者和他们给珀克斯的留言后,这些物品的性质改变了,它们是与邻里间互助互爱的情感相联系的,是伦理情感的关联物,沟联起了珀克斯、孩子们以及火车站附近居民的道德伦理实践,进而生发出公共性的道德情感,以及团结性、成员身份的归属感、情感共享性等促进伦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要素。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孩子们筹集礼物的过程包含了某种“以物易物”的礼物置换策略,例如,孩子们通过赠与兰瑟姆太太生日礼物的方式,得以换取其承诺给予珀克斯的童车,这一礼物置换的中间环节与策略过程,愈发密切了公共生活空间居民的情感交互与伦理关联,使得互动仪式承载的道德情感趋于深化与升华。由此,凭借公共性的伦理行为,共同体成员得以共享情感价值与伦理关系,形成了彼此联结的道德情感互惠机制,以及对共同体身份的符号认同,孩子们筹集礼物时使用字条“记下了人们把东西交给我们(孩子们)时说的话,还记下了他们的名字”^{[14]170},此处的字条可以理解为社群互惠关系的符号化的身份凭证,它能够表征对公共性价值观念的认同。这些符号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基于互惠原则的社会关系网络,并进一步构成一个互惠伦理共同体。

(二)公共空间中互惠共同体伦理关系的确认

《孩子们》中的公共空间除了邻里生活空间之外,最重要的社群沟通交流场所便是火车站站台与候车厅这一空间。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汇聚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伦理交往也在这里频繁发生。可以说,火车站站台与候车厅是小说中孩子们在家宅空间之外,突破家庭伦理关系进入社群伦理关系以确认自身伦理身份的实践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孩子们得以获得家庭伦理身份所赋予的伦理价值与伦理认同之外的社会性伦理认同与身份确认。孩子们通过家庭伦理关系的重构获得并凸显其主体性的伦理身份的同时,也通过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公共事务获得了更具公共价值的主体性身份,确认了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归属感伦理价值与关系。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小说中的一个关键情节中,即孩子们发现铁轨被泥沙掩埋后,为了避免即将通过的火车发生危险而不顾个体安危,机智而勇敢地拦下火车。孩子们的行为避免了一场严重的事故,拯救了火车上乘客的生命安全,这毫无疑问是具有社会道德价值的英勇行为,值得获得社会共同体的认可。围绕这一经典的伦理道德境遇,小说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中呈现了一场社群基于一致的价值理念所营造的共同体价值确认与身份认同仪式。

在小说中,由于铁路险情的及时发现与避免,孩子们获得了铁路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的一致肯定与赞扬,铁路公司为了表彰孩子们的勇敢和突出贡献,特地为他们举行了一场授奖仪式。在孩子们看来,授奖就是另一次礼物的赠予仪式,而这个授奖仪式恰恰彰显了孩子们于社会公共空间中所获得的伦理肯定与道德认可。授奖仪式的举行让火车站候车厅这一日常的公共空间,转变为阐扬公共道德价值的空间,增添了崭新的空间伦理内涵。授奖仪式在本质上即是一种社会互动仪式,其核心机制包括社群居民的聚

集与相互关注、情感交流与公共道德的认可等过程,“小范围的、即时即地发生的面对面互动,是行动的场景和社会行动者的基点”“在该过程中参与者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并彼此相应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微观节奏与情感”^{[13]19}。由此,借助相互作用与影响的身体在场要素,促使社会公共伦理系统逐渐生成,进而推动道德伦理共同体的建构。小说中对火车站候车厅举行的授奖仪式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包括布置隆重的仪式空间,模式化、程序化的授奖仪式过程等。通过特定程序结构与行为过程的时间性与空间性要素的结合,整个仪式过程不断地推动着主体间的互动及其伦理情感的互通。例如,当区长发表讲话赞扬孩子们的勇敢与镇静时,小说写到“在场的人全都鼓掌说:‘对,对。’”^{[14]126}彼得代表孩子们答谢发言后,又是大家的一致鼓掌,“鼓得比区长还要响”^{[14]27},之后大家又和孩子们一一握手。这一切都表达着仪式过程中的集体认同感,以及在共同认可的道德价值观联结下的共同体归属感。由此可见,授奖仪式催生着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道德价值,且持续生成了公共性、集体性的聚焦点与情感互动,借助感官信息、知觉经验等诸多在场的体验性要素,唤起道德情感认同,进而催生出共同体意识的修辞结构,建构着基于道德伦理身份认同的互惠伦理共同体。

三、铁路空间与跨阶级/地域的互惠共同体

小说中的铁路空间作为现代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场域,以及催生空间移动、扩展与共享的空间形象,发挥着重要的空间伦理作用。“铁路并非静态的工程奇迹抑或工业资本主义的应用技术,而是强大、多变、特异的历史建构与文化体系,反映着社会现实的运作机理,协助着诸民族应对现代性的承诺与危险。铁路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映现着现代性本身即是矛盾的历史进程产物。”^{[15]3}内斯比特依托具有移动性、共享性、现代性内涵的铁路空间,展现了突破现代生存困境、消除社会不公的愿望,借助铁路所带来的空间异质性元素以实现空间正义的伦理诉求,推进了关涉乌托邦愿景的空间伦理构建^[16],进而形塑一种跨越阶级局限与地理空间区隔的互惠共同体。

(一)空间权利资源调度与跨阶级互惠共同体

19世纪大规模修筑的公共铁路系统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空间产品、空间资源等的调度与重新分配,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空间生产及分配的公平与正义。“移动性是一种沟通内涵与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抵制专制政权的方式”^{[17]xv},移动性因其前所未有的速度缩短了跨越空间的时间距离,破除了均质化、单一性的空间压迫结构,破除了空间垄断与封锁,建构了合理的空间形态,推进空间权利与空间资源分配的对称与均衡,增强了地理空间的包容性、开放性、共享性。1848年,英国的蒸汽火车突破时速128公里,铁路运输的距离大大增加,大西部铁路伦敦到潘赞斯的里程超过400公里,跨越半个时区。由于英国各地根据太阳运行实测时间,因此火车里程的延长必然造成列车运行的混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52年11月1日,伦敦到普利茅斯(Plymouth)300多公里的铁路电报系统开通,之后又不断扩大至整个英国的铁路系统。通过电报报时,使得全英国的铁路时间统一为伦敦格林尼治时间。时间的统一进一步推动了空间区隔的消失,促进了空间权利资源的共享,这“必将刺激一种平等、自由的习惯,对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壁垒起到强劲的突破作用。”^{[18]186}《孩子们》中,主人公孩子们的生活际遇及空间体验是与铁路空间密切联结的,“铁路一下子成为他们新生活的中心,还给他们带来了种种奇迹和变化。”^{[14]18}孩子们与铁路的密切联系,得以催生崭新的生命景观,铁路强劲的速率、节奏与冲击力,持续赋予他们生存际遇剧烈的变化与革新,使他们持续不断地突破因变故所造成的阶层滑落及与之伴随的种种局限与困境。小说中描绘了孩子们搬到铁路边的住宅后第一次去看火车的体验,“他们爬到木栅栏顶上,忽然传来一阵隆隆声,他们马上向铁路右边看,那儿是岩壁下隧道的黑色大口,一转眼,一辆火车响着汽笛喷着气从隧道里出来了,在他们面前隆隆地开过。他们感觉到了它开过时的冲力,铁路上的小石子在它开过时欢蹦乱跳。”^{[14]30}从此以后,到铁道边看火车,体验其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空间跨越成为寄托孩子们憧憬与希望的行为。跨越阶层阻隔、代际界限、身份限制的希冀在孩子们不断实践这一行为的过

程中也确实实地实现了。

小说中有一位关键人物——每天乘坐九点十五分火车经过,并与孩子们相互挥手的老先生。随着叙事的推进,老先生的身份得以揭示,他是铁路董事会的董事。因此,他在孩子们遇到困难时不断向他们提供着有效的帮助,协助孩子们跨越一个又一个生活困境。老先生作为铁路董事会的董事,恰恰代表了铁路打破阶层区隔的巨大力量,他以同情心与善意之举为理想的社会道德伦理图景提供了典范。小说人物身份与铁路系统的象征性关联暗含着对于铁路所型塑的空间秩序与社会伦理关系的确认,而“这一时期的道德伦理特征得以概括为人道主义、公共责任与社会服务。”^[19]老先生的慷慨救助体现的正是社会普遍所倡导的这种人道主义、公共责任与社会服务实践。总而言之,在小说中铁路公司及公共铁路系统象征的现代性空间,保障着弱势边缘群体的空间权利与诉求,借由特定方式推进了空间正义的实现,进而破除诸种社会阶层的区隔与壁垒,昭示出对差异化、多元性的空间伦理关系的呼唤。

(二)突破地理空间限制的互惠共同体愿景

“空间正义不是要消除差异,不是以抽象的普遍性来压制和融化差异,而应该是尊重差异,尊重不同的阶层、民族、种族、性别、社群的空间权益。”^[20]《孩子们》中的铁路空间被赋予公平、正义的空间地理品质,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小说的另一个核心情节中,即母亲与孩子们对于陌生俄国男子的救助。

孩子们在火车站发现的俄国男子是一个被俄国政府抓捕并放逐的作家,他的悲惨遭遇又是由于对本国贫困阶层现实处境关切,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揭示。正是铁路所促成的空间移动的可能性让这个俄国人得以逃脱原属空间的权力压制,经由一个代表着开放性、包容性的公共交通空间,与小说主人公孩子们相遇,进而获得了摆脱困境,重获自由与幸福的机会。这里充分显露了小说作者希望破除与专制权力相联系的非正义空间,并借由铁路这样的现代公共空间的扩展实现更大范围的空间正义与空间自由。因此,同样是依靠铁路董事老先生的帮助,俄国男子找到了他的妻儿。通过人物命运的改变,小说为读者具象化呈现了铁路空间促进空间正义,打破地理空间限制,实现更广大空间范围上自由共同体形塑的力量。

由此可见,铁路空间的治理对象是地理空间的区隔化、均质化与单一性境况,以及其所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平等、不正义,进而营造空间权利的共在、多样与包容,实现空间生产的共享性与差异化。在这一层面上,与小说中铁路空间相对照出现的是运河空间的治理实践。小说中写到孩子们为数不多的一两次运河边的遭遇,他们面对的是船夫的排斥与驱逐,运河驳船上的男孩朝他们扔掷煤块。运河及其周遭的地理空间呈现出的是绝对的排他性与闭锁性,诸种表征隔阂的行动也使得孩子们感到挫折与沮丧。运河空间与铁路空间的伦理秩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对照,“铁路上所有的人都对他们好——站长、那位搬运工人和招手的老先生。运河上的人对他们却并不客气。”^{[14]68}。

如果说铁路空间象征着开放自由的共同体伦理,那么小说中的运河空间则对应着封闭、排外的伦理价值。然而,运河空间充满敌意与隔阂的伦理关系最终也被破除。其推动者正是小说中的孩子们,他们以互助伦理价值为引导,奋不顾身救出被困于失火船舱的婴儿。孩子们的利他品格获得了运河船夫的接纳与认可,消除了封闭的空间隔阂与地理区隔,破除了运河空间固有交往形式的封闭性与禁锢性,使包容性、差异性的伦理秩序取而代之。随着船夫对新的共同体伦理的认可,“他已经告诉全运河驳船上的人,说我们是真正好样的,他们要像对待好伙伴一样对待我们,就像我们对待他们一样”“所有我们遇到的人,他们说我们要钓鱼随时可以钓。”^{[14]152}孩子们也凭借他们的正义慷慨之举,获得了运河上众人的道德认可与情感接纳,进而重构了空间伦理秩序,实现了对既往伦理关系的重组与调整。互惠共同体伦理得以进一步突破铁路空间,扩展至更为广阔的运河空间,获得更大范围的主导性与支配性。这一情节安排暗含着小说作者对于在更为广大的空间范围内,构建互惠伦理共同体的期待与愿景,这一共同体及其所遵循的伦理原则与其所构建的伦理秩序将借助铁路空间跨越不同地域甚至跨越国家边界的阻隔,实现互助伦理主导的理想共同体在空间层面的不断扩展与延伸。

四、结语

内斯比特的儿童小说中,儿童主人公作为社会发展的未来与希望,对于道德文化共同体的形塑、道德伦理理想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这反映了作家的儿童观包含了对儿童在共同体建构过程中作用的强调。18世纪以来西欧的新教育运动倡导一种儿童中心论,即认为儿童绝非无知无能的被动角色,而是自我世界的建构者、成人文化的贡献者。《孩子们》这部小说无疑呼应了新时代对儿童的伦理定位,将儿童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使其切实参与空间伦理的建构,推动一种作家所憧憬的互惠伦理共同体的空间形塑与扩展,借以在文本层面实现作家的理想道德建构。

所谓空间伦理是借助空间的型构使其承载伦理关系与道德秩序的形塑,空间伦理进而也可以支配道德行动与伦理实践,最终实现一种共同体的构想与认同。《孩子们》通过文学叙事对空间的表征达成了对其所承载伦理关系的呈现,其中既包含了既有的现实伦理关系,也包含了突破旧的不合理的伦理关系,构建更为合理的新伦理的想象。小说通过家庭空间的重组,社群空间的联系以及铁路公共空间的隐喻性呈现勾勒出互惠共同体的发生、发展乃至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在小说中则是以家庭互惠共同体的形成为起始,借助社群互惠共同的稳固以及对铁路空间所代表的现代性平等自由共同体的憧憬,使得以互惠伦理为基础的共同体想象不断外扩、发展为跨越时空阻隔、突破阶层界限的更大空间范围的互惠共同体。这一伦理空间的扩张过程凝缩着作家内斯比特的社会改革理念,可以看出作家对于在英国型构一种基于新型伦理关系的共同体充满期许,并通过其文学想象与创作积极倡导着这一新型共同体的实现。因此,小说《孩子们》不应仅仅被视为儿童小说,内斯比特在小说中所构建的互惠伦理共同体是对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转型期共同体焦虑的有力回应。

参考文献:

- [1] CROUCH M. The Nesbit tradition: The children's novel in England, 1945—1970[M]. London: Benny Hardouin, 1972.
- [2] NOIMANN C. "Poke your finger into the soft round dough": The absent father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Edith Nesbit's *The Railway Children*[J].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2005(4): 368-385.
- [3] ANDERSON S. Time, subjectivity, and modernism in E. Nesbit's children's fiction[J].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2007(4): 308-322.
- [4] PARKES C. Commercialism and middle-class innocence: The Story of the Treasure Seekers and The Railway Children[M]// PARKES C.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apit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101-129.
- [5] 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6] 卡斯腾·哈里斯. 建筑的伦理功能[M]. 申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7] BARNHILL L R. Healthy family systems[J]. The family coordinator, 1979(1): 94-100.
- [8] POLLOCK L A. Forgotten children: Parent-child relations from 1500 to 190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9] SHORTER E.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0] GRIFFIN E. The emotions of motherhood: Love, culture, and poverty in Victorian Britain[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18(1): 60-85.
- [11] BRIGGS A. Victorian people: A reassessment of persons and themes, 1851—1867[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 [12] 李维屏. 论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跨学科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 2020, 42(3): 52-60.
- [13]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14] 伊迪斯·内斯比特. 铁路边的孩子们[M]. 任溶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15] ESPOSITO M. A world history of railway cultures, 1830—1930: Volume I[M]. London: Routledge, 2020.
- [16] MURRAY L, OVERALL S. Moving around children's fiction: Agentic and impossible mobilities[J]. Mobilities, 2017(4):

572-584.

[17] ADEY P. *Mobility*[M].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18] 张杰. 火车的文化政治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9] STRAND M. Th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moral universalism; Social justice in Victorian Britain, 1834—1901[J]. *Theory and society*, 2015(6): 537-573.

[20] 张佳. 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探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82-89.

Spatial Shaping Mechanism of Reciprocal Community:

Spatial Ethics in Nesbit's *The Railway Children*

GUO Xing, LIU Qingla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Railway Children* by British children's author Nesbit includes a wealth of insightful geographical ethical implications. With the narration of multiple geographical spaces, the novel depicts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reciprocal community in response to the ethical beliefs and moral practices that shape the modernization of British socie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novel specifically covers three spatial ethical structures: the family ethical space that shapes reciprocal community in family, the public moral space that strives to develop a community of mutual benefit, and the railway space which constructs reciprocal community across classes and regions. The novel highlights Nesbit's vision of moral construction rooted in children's subjectivity.

Key words: Nesbit; *The Railway Children*; spatial ethical construction; reciprocal community

(责任编辑:傅 游)